高校学费上涨不能是本“模糊账”

□本报评论员　郭振纲

—中国新闻名专栏—
社评

既要保障学校的办学经费，又要考虑学生的承受能力，需要建立一个长远的、符合规律和具有法律支撑的学费变动机制。高等教育财政拨款要兼顾所有学校，要建立大学的成本监控机制，特别需要明确的公共救济制度，以保障低收入家庭和“夹心层”家庭的子女上得起学。

据《中国青年报》7月18日报道，近日，广东、江西决定上调公办普通高校的学费，海南、内蒙古也召开相关的听证会。广东明确高等院校的学费标准将上涨20.2%，高职院校学费标准上涨约16.7%，高水平建设大学以及18个重点学科的学费标准将在具有博士授予权的本科院校学费标准的基础上再上浮10%。江西规定具有博士培养资格的高校本科专业学费上浮20%，具有硕士培养资格的高校本科专业学费可以上浮10%。这些学校的涨价方案中都提出学费的涨幅考虑了居民经济承受力，会加大对困难学生的补助。

3年前高校学费有过一波上涨潮，有的地区学费平均涨幅高达50%以上。今年一些高校准备涨学费，且涨幅高达20%以上，再一次触动公众神经。虽然涨价方案明示考虑了居民的经济承受力，但依然有不少人质疑上涨幅度的合理性和公平性，特别是一些贫困生家庭对此更是忧心忡忡。

高校学费何以要上涨？高校的理由是物价、人均收入和生均成本等都在上涨。不少学生和家长则认为，当下大学生学费和生活费加起来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多数家庭都有点勉为其难，现在学费又要上涨，无疑会带来更大的压力。其中，一些贫困家庭认为，高学费将导致孩子上不起学，至少会限制其选择学校和专业的范围。

高校学费应不应涨、涨多少合适，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需要在多种因素中找到合理的平衡点。大学不是经营单位，不能只算经济账，单纯考虑成本因素。大学也不是机关事业单位、慈善机构，不能只算公益账而不考虑投入，否则会失去持续发展的动力。大学是提供准公共品的单位，因此要考虑社会公平因素，要让贫困学生上得起大学。大学学费不可能长期不动，这不符合客观规律，关键是按照怎样的机制上涨。公众期待学费上涨的决策过程要公平、合理、透明、公开，上涨的幅度要考虑大学收支状况和公众承受能力，同时要建立对贫困家庭的“兜底”机制。

目前一些大学学费上涨理由之所以不能让公众接受和信服，有着复杂原因。一些大学的办学成本核算不透明，大学的年度经费花在哪些方面、花得值不值，往往没有以公开透明的渠道做出详细的说明。每年大学有多少经费用在对贫困生的补助上，是否建立起合理的奖、助、贷学金保障机制，这些内容在涨价方案中不能语焉不详。

还有，不同的学校、不同的专业、不同的师资，学费相差很大，相关部门的决策理由是什么？有的大学经费动辄上百亿元，有的学校得到的经费却很少，有没有明确的平衡措施？政府有关对贫困学生的保障机制是否执行到位？高校历史债务的化解是否成了涨学费的潜在因素？这些都需要明确的机制来保障。

目前，一些地方高校的资金压力较大、对学费依赖程度较高，既要保障学校的办学经费，又要考虑学生的承受能力，需要建立一个长远的、符合规律和具有法律支撑的学费变动机制。高等教育财政拨款要兼顾所有学校，要建立大学的成本监控机制，特别需要明确的公共救济制度，以保障低收入家庭和“夹心层”家庭的子女上得起学。大学学费的多少关乎教育“初心”，关乎弱势群体向上流动的机会，高校学费上涨不能是本“糊涂账”。

扫描二维码关注“钟鼓声”，看工人日报“钟鼓君”评论。

公园“铲牛牛”——有危险

据《成都商报》报道，四川人俗称的“铲牛牛”，也就是抽打陀螺的活动，最近遭到成都新华公园说“不”。该公园北大门处立起告示牌，禁止园内鞭击陀螺，“违者赔偿地砖损失费1万元人民币/次”。

抽打陀螺能活动筋骨，但其噪声响亮确实也够烦人的，而且据报道，长鞭子还造成过误伤游人眼睛的事件。公园为了游人安全和地砖维护，对其进行管理并不过分。与广场舞一样，“铲牛牛”作为群体性爱好，被一禁了之难免会引发抱怨。无论如何，公园姓“公”，必须以确保大多数人的安全为前提。

小狗“警示牌”——不可取

据《新文化报》报道，近日，湖南省衡邵高速某路段应急道上，一辆轿车爆胎，司机没找到三角警示牌，竟然把关着小狗的笼子放在车后不远处充当警示牌，两名女乘客也没有撤离到护栏外。巡逻交警发现后，先借给她们警示牌，再按规处罚。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时，驾驶人应在来车方向一百五十米外设置警告标志。这个“警告标志”指具有回复反光性能的红色三角牌。手头没三角牌便用其他物件充当，说明还是有一定安全意识，然而小狗和狗笼都不具有回复反光性能，一旦后车没及时发现，后果不堪设想。警告牌并不贵，为了自身和他人的安全，大可“破费”下。

买家“玩神秘”——好尝试

据《天津日报》报道，为依法查处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国家食药总局日前颁布了《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将于今年10月1日施行。《办法》规定对网络食品抽检采取“神秘买家”制度，即抽样人员以顾客身份买样和取证。

相比由工作人员持证上门对食品药品进行抽检，这种“匿名”的“神秘买家”模式无疑更贴近更真实。对商家来说，难以事先准备或临时筹谋；对监管者来说，买到的样品更真实，可以有效避免某些商家玩“偷梁换柱”的把戏，同时由于真实身份隐匿，商家贿赂监管人员的几率也降低不少。在电商时代，这种与时俱进的监管模式值得尝试。　□吴迪

北上广真的迎来“人口拐点”？

□毛建国

逃离北上广，可能不再是说说而已——据新华社报道，有统计称，截至2015年末，北京上海广州常住人口总数达近6000万人。但随着这几个城市相继提出人口控制和疏解的政策，去年，北上广等城市隐现“人口拐点”的信号。北上广三地政府今年上半年陆续公布的常住人口数据显示，北京出现核心区人口减少，上海出现人口负增长，广州出现人口增速阶段性放缓。

这种“人口拐点”的信号，可能是北上广希望看到的。近年来，这几个城市相继提出人口控制和疏解的政策，一些基层官员感觉任务压力很大，在考核指标上甚至排在GDP之前。然而，有必要指出，这种“人口拐点”的信号还不明显。从统计看，上海市首次出现10.41万人的负增长，北京和广州只是增幅下降。从这样的数据中，并不能得出“北上广”吸引力下降的结论，更不能认为“逃离北上广”会大规模出现。但作为一种信号，依然值得我们思考。

现在，大城市正在努力推动人口下降，但事实上，要想真正实现下降很难。从发展规律上讲，当一个城市经济处于快速增长通道时，人口的增加是必然的结果，这也是专家所讲的，“做人口减法比做经济加法确实要难”。更重要的是，要想实现大城市人口的“降”，很多时候功夫在诗外，即增强中小城市的吸引力。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选择漂在北上广。我们可以找出若干理由，比如发展机会多，人际关系更加单纯。而在优势之外，大城市也有自己的劣势，比如高房价等刚性困难。大城市所有的优势从一定层面讲，都是中小城市的劣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中小城市发展生态问题，这显然需要中小城市努力解决。

从未来城镇化的发展方向来看，我们需要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也需要一批富有特色、蒸蒸日上的中小城市。如同流动的水，人口在大城市减少了，必然要流向其他地方。大城市人口的下降，显然是中小城市发展的契机。如果中小城市不能发挥自身优势，就不可能起到分流作用，大城市的人口下降也不可能真正实现。从这意义上讲，能不能实现大城市人口的下降，还需要中小城市努力。

就目前来看，“逃离北上广”未必会大规模出现。就中小城市而言，如何进一步做好优势增量工作，不仅关系到中小城市的发展，而且关系到大城市人口目标的完成。对于大城市来说，在出台人口控制和疏解政策的同时，还应该积极扶持周边中小城市发展，帮助中小城市提升吸引力和分流能力。

新闻观察

一卡难求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时值暑期，大部分高校都已进入假期模式，但每天伴同学们左右的“校园卡(饭卡、一卡通)”却在假期中成为“香饽饽”，租赁“校园卡”业务在北京市部分高校校园中悄然繁荣起来，58同城、赶集网等一些网络信息平台成了他们的“主战场”。

一卡在手，就可以享受在校园里学习、就餐等便利，对“考研党”“校漂族”来说，校园卡的价值非常可观。如今看似愿打愿挨、两全其美的生意，其实存在不少风险与安全隐患。对租卡人来说，可能会租到假卡，而卡片也可能在租卡人被查验出冒用行为后被没收。此外，一些校园卡还承担着出入校园、图书馆、宿舍等区域门禁的功能，社会人员携卡随意出入，对在校学生的人身、财产安全来说都是一种威胁。对此，校方理当严惩学生出租“校园卡”的行为，同时是否可以考虑为有需求的社会人员开辟专门的校园资源使用通道呢？　□李法明/图　韫超/文

图说

如何看待“上高职还是普通高校”

□张海英

日前在京发布的《2016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显示：高等职业教育成为农村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途径，高职院校农家子弟的比重逐年上升，目前已达到53%。高职毕业生月均收入连续五年增长，毕业3年后月收入5020元。(见7月18日《人民日报》)

考不上重点高校，上高职似乎成了越来越多农村娃的现实选择。在一些人看来，农村娃上高职是一种无奈选择，难以缩小与城市娃的差距，甚至可能有人会认为，农村娃上高职不如复读再考，随便上个普通高校也比高职院校要好。这反映了一些人对农村娃现状缺乏了解，也对高职院校缺少客观认识。

有关数据显示，我国高考总人数连续多年下降，原因之一就是不少农村娃无奈放弃高考而选择打工赚钱。相比之下，选择上高职的农村娃很明智，出去打工没有一技之长，工作辛苦却挣不到多少工资，而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率近年持续走高，甚至超过一些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自己毕业后能找到不错的工作就能分担家庭负担。

从国内大环境来看，对上高职的农村娃来说是重大利好。一来，中国制造业要走向工业4.0时代，需要大量高技能工人，“工匠精神”也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成了舆论热词之一。农村娃选择上高职为自己选择了比较踏实的饭碗。二来，扩大职业教育规模为农村娃提供了更多向上通道。去年教育部等三部委印发的《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职业教育的壮大为农村娃上高职提供了更多选择。

农村娃上高职未必以后就要当工人，高职毕业生自主创业群体不断扩大，在浙江等地，很多企业老板就是技术工人出身。

当然，还要为农村娃上高职创造更多有利条件，包括保障专项财政经费、建立健全职业教育评价体系，让更多高职院校拥有社会认可的学位授予权，为高职毕业生就业创造更加公平的机会等。此外，我们还需要大力均衡城乡教育资源。

众话题

法痞的嘴脸

新华社记者

形同废纸的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折射出一种“法痞”现象：他们精通法律的条文，却知法“贩”法；他们明晰条文的软肋，便夹带“私货”。

过去3年，为了肆意扩权，临时仲裁庭强词夺理、偷换概念、强行管辖；为了强制裁决，临时仲裁庭罔顾史实、指鹿为马、公然挑衅。加上向来喜欢在国际场合鼓吹所谓规则与法治的美国在一旁摇摇小旗、喊喊口号，这场闹剧丑剧，活脱脱成了法痞各种嘴脸的表演场。

越俎代庖　枉法营私

临时仲裁庭2013年由时任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柳井俊二一手搭建。柳井长期担任日本外交官，属“右翼鹰派”，主张“亲美遏华”，堪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马前卒”。

作为一名法官，如此职业背景和政治取向，且与仲裁案中的当事方存在明显利益关联，柳井本该避而远之以守司法独立性原则。但他不仅没有回避，反而主动包揽仲裁庭的搭建，指派了5名仲裁员中的4人。

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相关规定，在仲裁当事方无法就指派仲裁员一事进行协商的情况下，可以由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代劳”。法律明文是“可以”，而不是“必须”。柳井便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自己指派仲裁员，其目的很明显：抓住“机遇”夹带“私活”。

临时仲裁庭的5名仲裁员分别是——加纳籍首席仲裁员托马斯·门萨、法国籍仲裁员让-皮埃尔·科特、波兰籍仲裁员斯坦尼斯拉夫·帕夫拉克、荷兰籍仲裁员阿尔弗雷德·松斯和德国籍仲裁员鲁迪格·沃尔夫鲁姆。其中，4人是国际海洋法法庭的法官，当时是柳井的“手下”。

为了“符合程序”，柳井还为不接受、不参与仲裁案的中国指派了一名仲裁员，即波兰籍的帕夫拉克。但熟悉国际法律界的专家一眼就看出，相比其他4人的“经验老到”，帕夫拉克资历最浅。

由此，柳井藏身幕后把自己违背国际法司法独立性原则的事实掩盖起来，把5名对亚洲缺乏了解、从未涉足南海事务的仲裁员推到台前，开始用法律语言炮制这出政治闹剧的台词。

学术堕落　食言而肥

据熟悉国际司法体系的人士介绍，在国际司法机构中，对仲裁员的专业要求原本就比国际法官要低，例如常设仲裁法院的仲裁员入职门槛低于国际法院法官。至于临时仲裁庭的门槛，更不可与国际司法机构相提并论。

至少三个现象足以让人对临时仲裁庭的权威性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其一，临时仲裁庭7月12日宣布所谓裁决结果后，国际法院、常设仲裁法院以及国际海洋法法庭纷纷出面与临时仲裁庭撇清干系，恐是不愿让临时仲裁庭仲裁员的专业水准拖累自己的名声。

其二，历史上，根据《公约》第287条设立临时仲裁庭方式推进的全部十多桩仲裁案，无一得以执行。其认同力可想而知。

其三，仲裁员和关键证人的出尔反尔，进一步说明了这些人的个人专业修养很成问题。

荷兰籍仲裁员阿尔弗雷德·松斯曾长期主张，确定岛礁的法律地位是海洋划界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但成为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仲裁员后，这位教授一改过去的立场，反而认为岛礁法律地位的判定可以与海洋划界问题脱钩，以此作为无视中方排除性声明的理由。

另外，在2015年11月关于实体问题的庭审中，菲律宾所请专家证人斯科菲尔德教授，一改以往其学术文章中称太平岛为“岛”的说法，在本案中将其定性为“礁”。此人过去曾在论文中言之凿凿地论证个人观点，即“南沙群岛至少存在12个地物符合岛屿定义并可以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然而在仲裁庭听证时，他却又改口称南沙群岛没有一个岛礁可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对于从事严肃学科的专家而言，谨言慎行是最起码的原则，180度的学术观点逆转，不是水平问题，而是政治和道德问题。

名为法治　实为人治

柳井搭建的临时仲裁庭，未经任何审查，是典型的“人治”班子。

只要翻翻几名仲裁员的底细，就可以梳理出柳井是怎样用“人治”替代“法治”的。

5名仲裁员中，除柳井指派代表中方的帕夫拉克外，其余4人均有仲裁经验。其中门萨曾参与审理过5桩涉及海洋相关争议的仲裁案，沃尔夫鲁姆参与审理过3桩。

翻看在过往仲裁案中的立场就会发现，他们都曾罔顾案件中隐藏的主权问题，都曾有随意扩大仲裁庭管辖权的先例。

菲律宾指定的仲裁员沃尔夫鲁姆曾在2010年12月至2015年3月参与仲裁查戈斯群岛案(毛里求斯诉英国)。当时，英国提出案件涉及主权问题，不在仲裁庭管辖范围内，但沃尔夫鲁姆联合其他仲裁员签署联名反对意见，一口咬定仲裁庭具有管辖权。

在荷兰诉俄罗斯扣押“北极日出”号破冰船仲裁案中，沃尔夫鲁姆虽不是仲裁员，但却与另一法官联名发布单独意见，指责俄罗斯“不应诉”的立场。

国际法专家指出，仲裁员过往经验中表现出对某一种有争议做法的固有意见可能会对其他案件的判断产生严重影响，导致在其他案件中出现预设立场或预判结果的可能，有损仲裁的公正性。

对此，柳井不会不知道。

也许，他比谁都清楚这一点。他只需在指派仲裁员前对候选仲裁员的过往倾向和观点进行大致判断，就可以拼凑一个完全倒向菲律宾的仲裁庭。

秘密网络　利益链条

对于法痞来说，钻法律的空子是看家本领。他们出于政治或经济目的，利用自己的法律专业知识，无视法律尊严，打着“程序正义”的旗号，在法律适用性等方面强词夺理，硬行解释，强行推进自己的意愿和结论。

现有证据已经表明，自2012年4月黄岩岛事件前，就已经有美国人在捣鼓用“国际司法”手段炒热南海问题的阴谋。也有证据表明，正是美国背后作祟，才促使菲律宾在黄岩岛事件末期作出放弃对话的决定，使中菲关系陷入僵局。还有证据表明，正是在黄岩岛事件后，美国通过当时的菲律宾阁僚献计，把阿基诺三世推上了仲裁的不归路。菲律宾有学者下结论：正是美国的阴招让阿基诺三世出了昏招。

把菲律宾推入仲裁案的死胡同后，美国大打所谓“法治牌”。2014年，美国和菲律宾发表支持仲裁案的联合声明。同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访菲期间公然表示支持仲裁案。

另外，没有美国法律团队的手把手策划，菲律宾根本无力提起仲裁。美国律师的贡献不仅仅限于帮助菲律宾起草了数千页的法律文书、代表菲方参与仲裁庭辩论，而且这个豪华律师团还与仲裁庭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代表菲方的美国律师奥克斯曼与临时仲裁庭的多数仲裁员以及柳井曾多次共事。虽有此经历，他仍然作为争端一方当事国的代理律师出庭，无视国际司法界的监督评价，公然挑战国际司法公正。

不仅如此，奥克斯曼与美国政府也渊源颇深。他曾作为助理法律顾问在美国国家海洋、国际环境和科学事务局工作十余年。另外，奥克斯曼还作为美国政府代表出席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并主持会议起草委员会英语语言组的工作。虽然，美国至今未签署《公约》。

有美国媒体透露，与美国利益关系极其密切的时任菲律宾外长德尔罗萨里奥向阿基诺三世推荐了奥克斯曼。

毋庸置疑，奥克斯曼与美国政府的关系、奥克斯曼与菲律宾的关系、奥克斯曼与仲裁员的关系、仲裁员与柳井之间的关系、柳井与安倍的关系、安倍与美国的关系，以及一些还不为人知的关系与利益链，已经编织起一张巨大的政治利益网络。

假借法律的名义，法痞们在这张关系网上忘情表演3年之后，把预设好的裁决结果公布于众，匆匆拉上这出闹剧的幕布，而国际司法则成了这些法痞践踏公平正义的幌子。

(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

大陆赴台游客发生严重车祸26人罹难

国台办启动应急处理机制

据新华社台北7月19日电　一大陆旅行团乘坐的游览车19日中午在台湾桃园发生严重车祸和火灾，造成26人罹难，其中包括24名大陆游客。

台湾交通事务主管部门观光局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证实，罹难的24名大陆游客来自辽宁海外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组织的游客团，另外2人为司机和导游。接待旅行社为钜龙旅行社。

事故发生于当日约13时，该游览车在行驶到台湾高速公路2号桃园机场联络道西向约3公里处时，撞上护栏起火，导致车上人员未能及时逃脱，全部遇难。

事发后，桃园消防局出动13辆各式车辆、30名消防人员抢救。台湾有关方面已成立灾害应变中心。

据台媒报道，参加现场救援的台公路警察说，从监视画面看，游览车先冒烟，继而擦撞外侧护栏。车头火势很大，警消人员都无法靠近。控制火势后清理现场时发现，大部分游客在车内第5排座椅后遇难，尤其是后车门处。桃园市政府警察局表示，26具遗体已送往中坜殡仪馆。

海旅会台北办事处主任满宏卫对新华社记者表示，死者包括16女8男，含3名儿童。海旅会下一步将对伤亡情况进一步确认，安排遇难者家属赴台，处理善后事宜。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当日表示，获悉消息后，国台办立即启动涉台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与台湾海峡两岸观光旅游协会紧急联系，了解核实情况，要求台湾有关方面全力处置，查明事故原因，妥善处理善后，加强安全管理，杜绝安全事故。马晓光表示，我们高度关切大陆同胞的生命财产安全，有关方面将派工作组赴台，协助家属处理善后。

接获台方通报后，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指示立即启动突发事件应急机制，要求海旅会台北办事处及时掌握最新情况，配合台方妥善做好事故处置。同时，通知辽宁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及组团社组织力量，迅速摸清组团情况，做好各项准备，及时赴台，与台方一道做善后工作。

爱讲故事的焦大姐

在内蒙古自治区伊图里河火车站，52岁的党总支书记焦玉芹是个很时尚的人，不仅写博客、拍照片宣传职工的劳动故事，还在QQ群、微信上疏导职工思想。今年“七一”，焦玉芹被评为黑龙江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了段里的名人，可她的知名度却远没有车站的伙计们响亮。

伊图里河站地处高寒冻土带，冬季最低气温接近零下50摄氏度，是我国最北部的铁路交通枢纽之一。只是艰苦的自然环境让年轻人望而却步，50岁以上的老职工却占了80%，人员紧缺、生产任务重，一时间车站里人心浮动，有的想调走，有的拈轻怕重。在车站工作了近20年的焦玉芹深知，要想改变这种现状，得先转变职工思想，但首先得听到他们的心里话。

焦玉芹先学会了微信，主动加职工为好友，有职工晒“幸福”时，她点赞祝福；有职工吐槽时，她安慰疏导。有一次，一个年轻调车员在微信朋友圈转载了一篇关于辞职的文章，焦大姐看后觉得他情绪不对，就找机会和他谈心，果然，小伙子坦言自己工作太累，看别人在外面赚钱挺容易的，就不想干了。焦大姐不动声色，先分析了当前的就业形势和小伙子辞职后面临的生活压力，然后又讲了很多从这个岗位上走出的人才，小伙子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冲动，此后，也更加安心本职工作。

不过，这次辞职风波还是让焦玉芹陷入沉思，曾经风光的“铁饭碗”为何不招人待见？工作多年的岗位为何会心生厌烦？是钱的事？还是感受不到岗位的价值？焦大姐决定，要用新闻报道的正面激励，让大伙拥有信心和自豪感。

从那时起，焦玉芹总是揣着本子跟着职工去站场上水接车，用冻得发硬的铅笔认真记录下他们的动作、对话，听他们讲自己或工友身上的故事。焦玉芹特意开通了博客，把这些充满感情的文章和图片刊载上去，虽然读者寥寥，她却依然坚持。今年春运，车站上水工的事迹在中央媒体上报道，网络各大门户网站也相继转载，极寒天气下默默坚守的车站工人一下子火了起来，全国各地的网友纷纷点赞，表达对铁路工人的敬意和感谢。

戴着大棉帽，穿着黄马甲，抱着上水管，从没想到如此平凡的自己竟然也能走上电视荧屏，车站职工们激动不已，而焦玉芹却在想着如何把这里的故事讲得更加精彩。

(张学鹏)